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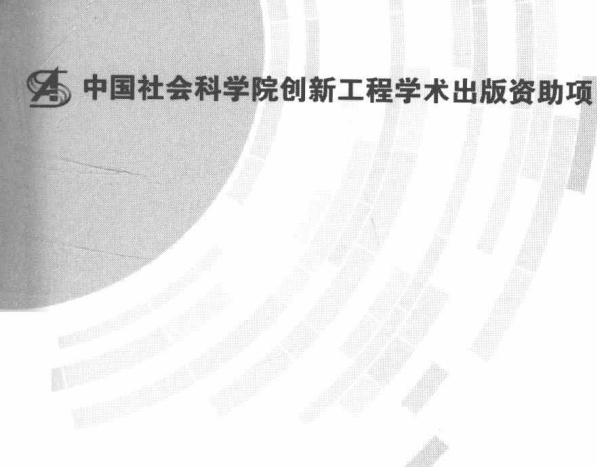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包容性增长 与结构转型： 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

李毅 毛日昇 徐奇渊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

包容性增长 与结构转型： 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

李毅 毛日昇 徐奇渊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包容性增长与结构转型: 新兴经济体的政策选择 / 李毅等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 - 7 - 5161 - 8590 - 2

I. ①包… II. ①李… III. ①中国经济—经济发展—
研究 IV. ①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5213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马 明
责任校对 郝阳洋
责任印制 王 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3
字 数 306 千字
定 价 8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理论综述与研究的整体框架	(1)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本项研究所使用的理论方法和整体研究 框架	(1)
第二节 包容性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研究综述	(6)
第二章 世界经济增长重心转移与结构调整	(24)
第一节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背景	(26)
第二节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进展	(34)
第三节 影响结构转型的因素分析	(49)
第四节 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和发展趋势的 影响	(53)
第五节 本章小结	(66)
第三章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及中国的角色研究	(74)
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变化	(74)
第二节 新兴经济体在中期面临的挑战及其风险点	(78)
第三节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长期趋势脱钩:中国将发挥关键 作用并受益	(91)

第四章 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制造业产业升级	(108)
第一节 中国与其他 APEC 成员经济体贸易竞争力的国际比较 ——基于贸易数量角度的分析	(109)
第二节 中国与主要经济体出口产品质量的国际比较分析	(145)
第三节 德国和意大利制造业发展对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启示	(176)
第五章 就业市场再配置：教育、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分配	(196)
第一节 中国就业市场再配置效应的分析：基于劳动力需求 角度的分析	(196)
第二节 劳动力转移与劳动力市场分割：基于劳动力供给角度的 分析	(211)
第三节 劳动力技能结构与教育供给	(231)
第六章 资源环境、气候变化与新兴经济体的低碳转型	(255)
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发展道路选择与环境 成本	(259)
第二节 通向可持续发展的国际低碳行动及影响：基于金砖国 家的实证分析	(269)
第三节 新兴经济体实现经济可持续低碳发展的战略及 路径	(283)
第四节 渐进式向低碳模式过渡：对中国的启示	(294)
第七章 中国与新兴经济体国家的金融合作	(307)
第一节 与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中国对外金融战略视角	(309)
第二节 中国与金砖国家在开发性金融领域的合作	(322)

第三节	推动亚投行建设、增强多边发展融资体系的包容性	(332)
第四节	亚投行的发展融资理念的一个案例分析:尼泊尔的生姜产业发展	(338)
第八章	解决结构转型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意义及其政策选择	(344)
第一节	新兴经济体国家解决结构转型问题的发展经济学意义	(344)
第二节	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政策选择	(346)
后记		(359)

第一章

问题的提出、理论综述与研究的整体框架

结构转型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是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当前所面对的重大理论与现实课题。同时，鉴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位置，在经济全球化的意义上说，这也是世界经济整体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项研究的出发点，是中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问题意识。

◇◇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与本项研究所使用的 理论方法和整体研究框架

新兴经济体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的一个焦点话题。因为拥有巨大发展潜力并且是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上升力量，新兴经济体曾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域，而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例如在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接连遭受危机的冲击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影响，失业率高企、消费疲软、增长乏力。而金融体系并未受到根本性损伤的新兴经济体，只是由于受到危机下的外部需求急剧下跌的影响出现了经济下滑。在采取刺激措施后实现了强劲增长。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数据，在 2010 年的全球经济反弹中，与发达经

济体 3.1% 的增速相比，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为 7.3%。此间，中国、印度、俄罗斯三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甚至超过了 50%，其他新兴经济体也有不俗的表现。因此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在发达经济体饱受金融危机困扰之际，新兴经济体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稳定的来源”。但是，随着全球性危机的进一步蔓延，其对新兴经济体的深刻影响日益显现出来，国际上出现了对新兴经济体的质疑之声。尽管这类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并不改变其发展上升的趋势，但其在目前阶段面临的发展困境是需要认真加以对待的。例如外资撤退、本币贬值、还债压力陡增，尤其是外部市场的萎缩和内部市场的开拓能力不足、经济增长迅速减缓，使其因粗放式发展而积存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它们在多数国家集中地表现为能源短缺和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产品的附加价值低和国内需求不足，污染严重和环境恶化，区域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致使增长的成果不能普惠大众。于是，面临着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解决的结构性问题，包容性增长的概念进入人们的视线，对它的研究受到了人们更多的关注。^①人们之所以关注这个问题，关注这类国家的发展，是因为新兴经济体的发展状况如何，不仅关系到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这些国家自身国民福利的增加，而且关系到世界经济这趟时代列车整体的运行态势。

根据相关学者和机构的已有研究，包容性增长的基本要义为“经济增长，权利获得，机会平等，福利普惠”，^②本质上就是一个实现发展

① 最早的包容性增长概念出自 2004 年林毅夫的一篇论文（Justin Yifu Lin, 2004），随后在印度政府 2006 年制定的“十一五”规划中也使用了这个概念。2007 年、2009 年，亚洲发展银行和世界银行等组织对包容性增长问题进行了研究。

② “依此逻辑，包容性增长就是要在革除权利贫困和社会排斥、倡导和保证机会平等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民众的福利得以持续改善和增进，民众的实质性自由得以保障和扩展。”（杨英杰等，2014：第 7—8 页）

和如何发展的问题。伴随着这些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其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其经济转型是一个必然到来的过程,即新兴经济体的经济由先前的粗放式发展向集约式发展转变,由以往注重经济量的增长向注重质的提高转变。而从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后危机时期发达经济体经济恢复的疲软造成的世界市场需求不足,使支撑新兴经济体增长的外贸活动严重受挫,但影响其实现经济转型的主要制约因素,还是其内部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所导致的增长瓶颈。危机以来的世界经济形势和新兴经济体国家的起落性发展状况表明,这种认识是符合历史事实的。那么,如何能够有效地解决这种结构性问题,顺利地消除发展的瓶颈?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自2008年世界性危机发生以来,已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多年。但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对危机进行结构性问题反思并迅速作出明确应对情形不同,新兴经济体国家对转型的认识却显得不那么清晰,结构性问题对经济发展的拖累则显得越发沉重。问题究竟出在哪里?新兴经济体国家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以及当前它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所处的位置,给了我们一个与发达工业国家近距离比较的可能,进而促使(启发)我们从发展中大国的视角,来探讨新兴经济体结构性问题解决可能有的有效途径。也就是说,问题的复杂性需要深入的比较和不同国情下的细节研究。由于中国作为一个迅速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大国,是新兴经济体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因此,我们的研究将把如何推进经济结构的转型作为实现包容性增长的重点,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下,以致力于解决棘手的结构性问题的中国为主要研究对象。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途径,探讨新兴经济体在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实现包容性增长过程中应当进行的政策选择。因为,有效地推进中国的结构性问题的解决,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正是本项研究的终极目的。

为此，本研究将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意识出发，运用宏观与微观经济分析、计量经济学，以及经济史检验等方法，力求在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和全球技术、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化中，研究和揭示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理论性和规律性认识，注重思想性成果的同时，在战略的高度上探索解决新兴经济体发展瓶颈的途径；注重对结构转型所涉及主要问题的细节和发生过程的研究，为最重要的新兴经济体——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提出有效的政策选择和实现协调性发展的可行思路。与上述目标相联系，本项目的研究按照如下框架展开：在对包容性增长与经济转型的已有研究进行简要梳理的前提下，我们将以对世界经济结构调整与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世界主要类型国家结构转型的整体状况分析为开端，研究和分析新兴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角色。尤其集中研究以下几个相互联系，且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普遍存在的主要结构性问题，即研究其贸易结构的变化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就业市场再配置：教育、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分配；资源环境、气候变化与经济结构的转型。由于新兴经济体国家解决其经济转型中的结构性问题，是在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进行的，而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不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情况下，急需新兴经济体国家共同应对，因此本研究将通过研究中国与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合作，来探讨合作对于新兴经济体国家实现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力求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度理论探索，尤其是对新兴经济体国家主要结构性问题的微观考察与深入研究，能够在结论部分提出我们对解决这些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认识，以及战略层次上的政策选择。（见图 1—1 研究思路与整体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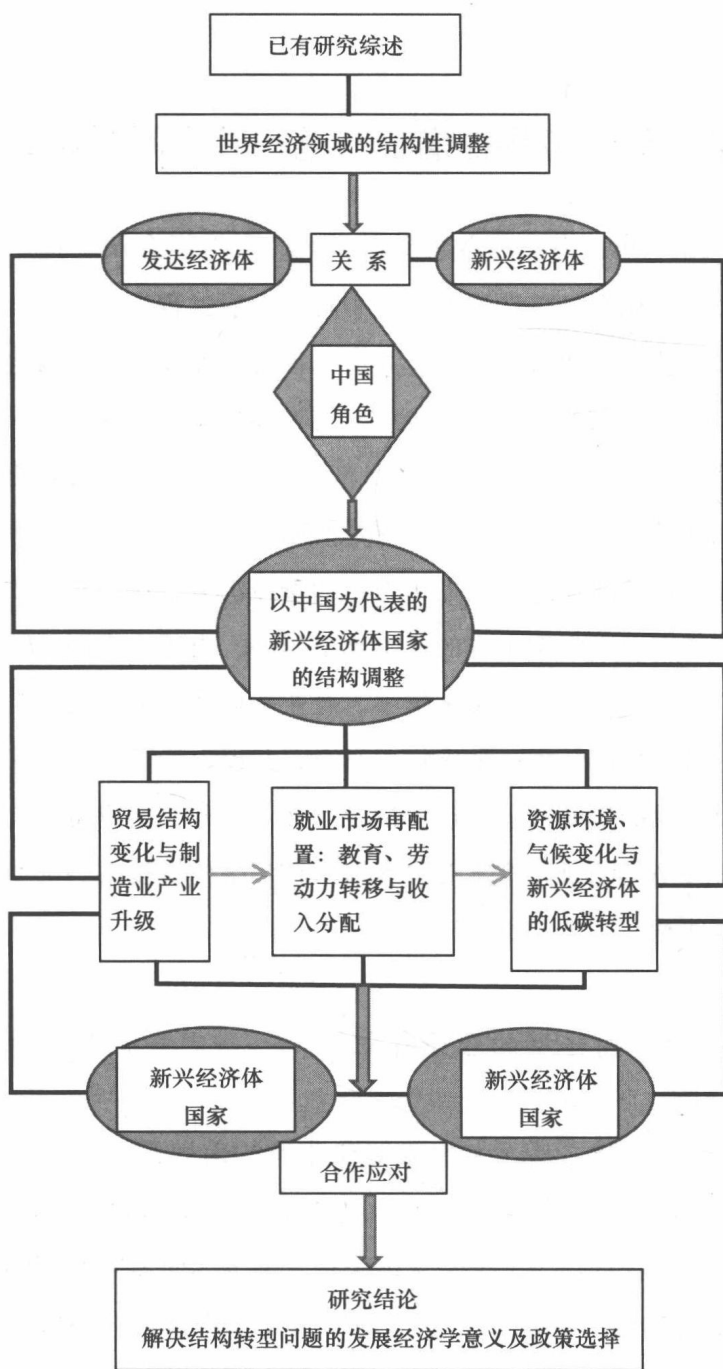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思路与整体框架

◇◇ 第二节 包容性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研究综述

2009—2010年，中国政府两次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提出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强调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发展过程中的社会问题，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相较于之前的经济增长概念，包容性增长更加强调突破增长的概念、实现发展的结果，更多地关注经济增长中带来的贫困陷阱、分配不均、社会流动性差等问题，这需要更好的制度设计，也需要更健康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合理的产业结构。近年来，随着经济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发展早期所依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高，由于生产附加值没有得到有效提升，企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产业如何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转型，并进一步向知识技术密集型升级，并以此为契机逐步实现包容性增长，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因此，这里将主要从中国的视角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线索对包容性增长与结构转型问题的研究进行简要的分析与回溯。

一 关于结构转型的理论探讨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大批亚洲和非洲的前殖民地纷纷独立，由于“大萧条”的冲击，许多发达国家仍处于低谷，而苏联则成功实现工业化。应该采取怎样的经济政策来发展经济，成为当时国际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Lewis（1955）提出“二元经济”概念，将整个经济区分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劳动者处于隐性失业状态，且市场出清的工资水平低于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低工资水平。工业部

门按照边际生产率雇用劳动力并支付工资。当资本积累或技术进步导致工业部门的劳动力需求曲线不断向右移动后，两需求曲线的交点达到生存工资以上时，剩余劳动力被吸收完毕，此时称为“刘易斯拐点”。这一时期，研究经济增长的理论包括 Harrod-Domar 模型（Harrod, 1939; Domar, 1946）、Solow 模型（Solow, 1956）、Nurkse 的“平衡增长”理论（Nurkse, 1953）、Rosenstein-Rodan 的“大推动”理论（Rosenstein-Rodan, 1943）、Chenery 的“两缺口模型”（Chenery and Bruno, 1962; Chenery and Stroutr, 1965）等。研究者强调资本积累的作用，并认为由于市场包含内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政府必须在调整经济结构的过程中起到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协调各种资源配置，强力推动工业化进程，在大机器工业部门建立公有制企业、促进资本积累、通过进口替代政策缓和外汇紧张状况等。根据对资本依赖程度的不同，研究者主张由发展中国家政府主导，推动经济结构从劳动密集型的农业生产向资本密集型的工业生产过渡。Leibenstein（1957）提出“临界最小努力”理论，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中，收入水平和投资有助于收入进一步增长，而人口增长速度会抵消人均资本积累，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保证投资率足以使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水平得到明显的提高，即以临界最小努力使国民经济打破低收入稳定均衡，获得长期的持续增长。Rostow（1960）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将经济发展区分为若干阶段，从传统社会到起飞阶段的第一必要条件就是生产性投资率的提高。从政策实践来看，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殖民主义统治的发展中国家此时国家主义情绪高涨。它们主张在政府高度保护下进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发展战略，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着力发展关键产业部门，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采取的措施包括以价格控制、利率优惠等方法对重工业部门进行大量的保护补贴，降低这些企业的投资和运营成本，建立行业垄断和准入规则，确保资源的调配。由于扭曲了资源配置、供求关系和价格，缺乏有效

的激励机制，这些政策实践事实上多以失败告终，造成的经济后果是大规模国有化运动抑制了私人经济的积极性，政府的高度保护政策削弱了农业的发展，工业也因此缺乏强劲的出口能力，中间货品和资本货物大量输入引起国际收支产生巨额逆差，导致外汇短缺、外债激增，而庞大的政府机构由于侵占了大量的财政收入且管理能力下降，以致出现了社会动荡。这些例子在拉丁美洲、非洲、东欧和亚洲各国中屡见不鲜。

20 世纪 70 年代的滞胀、80 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转轨动摇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地位，驳斥了政府财政和货币政策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的信条。研究者认为，强行推动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优先发展，违背了发展中国家在其所处阶段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从“华盛顿共识”开始，研究者逐渐转向自由市场政策导向。在理论研究方面，发展经济学摒弃了用线性模型解释经济增长，不再通过跨国回归实证研究来识别经济增长决定性要素。研究者认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匹配情况是一个从较低向较高水平逐步提升的过程，这个过程不能通过政府的外在干预来跳跃性地推进，政策干预产生的匹配结果不具有可持续性。初级发展水平国家的要素禀赋优势是劳动力或自然资源相对丰富，而劣势是资本相对稀缺；因此政府应该利用禀赋优势发展经济而非人为推动工业化进程。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此时通过引进外资等方法，充分利用了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并及时实现了从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从而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发展取得了成功。这一时期，新古典经济学逐渐发展了较为成熟的思想体系和分析工具，并在经验上获得了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支持，逐渐取代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地位，成为政策分析的基础。此后的很长时期里，发展经济学放弃了对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空洞探讨，不再致力于发展自己特有的理论和模型，而是大量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论来分析发展问题，分析内容从高度宏观逐步向微观转变，以“家族”和企业的微观行为为基本对象，通过微观计量的

技术评估和分析具体发展政策的影响，例如扶贫、教育、医疗、信贷、农业技术推广等。一些经济学家指出，发展经济学的研究逐步领域狭窄、一般意义缺乏，对扶贫、促进结构变迁和经济持续增长缺乏启示。

20 世纪 8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华盛顿共识”及其一系列经济自由化、私有化的政策在推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方面的效果并不理想。超过 3/4 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没能实现进一步发展，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徘徊；其中一些经济体甚至无法保持中等收入水平，变得更加贫穷。随着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的不断拉大，经济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如何实现持续增长的问题，得到了理论界的广泛讨论。研究者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Gill and Kharas, 2007），认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但这一优势无法在后续的经济发展阶段持续。随着富余劳动力的消失，产业雇佣工人的机会成本得到提升，企业争夺员工并带来工资上涨，这就制约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于是曾经引领经济增长的出口产业会出现下滑甚至趋于消失，其最后结果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长期停滞。罗默等人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他们将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列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此时原本以数量衡量的劳动力要素可以通过技术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得到深化。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为了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需要建立使新设计或创意能产生和使用的机制，这就要求政府政策的制定必须重视教育发展和科技投入、激励和保护创新（Romer, 1986, 1990; Lucas, 1988; Grossman and Helpman, 1991; Aghion and Howitt, 1992）。与新古典理论相比，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突出了知识投资的重要性。在政策实践中，一些国家在中等收入阶段通过有效提升产业价值链，进入正在不断扩大的、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市场，包括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它们从原本落后的农业经济沿着产业阶梯进行了迅速的产业升级，成功实现了从中等收入到高收入行列的转变。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中国、越南和毛里求斯等内向的、

国家管制的经济体逐步渐进地向市场经济过渡，也获得了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然而它们所取得的进步目前仍体现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型阶段，在进入工业化之后，逐渐让人力资本、技术这些要素发挥经济增长的作用，是这些国家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寻求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重要路径，这些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外在表现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

二 发展中国家产业转型与其面临的要素市场问题

理论上，一个国家最优的产业结构应当由其要素禀赋结构的比较优势决定。市场有效反映经济增长中各要素的实际价格，将影响资本、劳动、技术等的配比，从而界定了相应的生产方式和产业结构。一个经济体的禀赋及其结构（定义为自然资源、劳动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相对丰裕程度）在每一个特定的发展水平是给定的，并随着发展水平不同而不同，经济体的最优产业结构会发生动态变化。然而，问题是经济体的产业结构会否在市场的推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自发不断变化。从多数中等收入陷阱的存在现实来看，产业结构不会自发向最优调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些中等收入国家，随着剩余劳动力被逐步吸收，劳动力使用和能源消耗的成本都在持续上涨，要素相对价格发生了变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了。与此同时，发达国家长时间占据着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的优势，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如何在其中找到一席之地，发掘自身新的比较优势，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确定适合自己的最优产业结构的最为关键的问题。

很大程度上，市场没有通过价格引导使产业结构自发升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要素的市场没有有效发挥作用。这里的问题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发展中国家本身的市场并不完善；其二是“技术”要素的特点决定的市场失灵。在市场不完善方面，以金融市场为例，中国的银行贷款利率

长期低于民间贷款利率，企业面临的实际融资成本较低，这扭曲了资本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价格，其结果是一方面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被过度使用，另一方面投入成本决定了生产过程不会对资本的边际产出率提出高要求，宏观经济中实际达成的产业结构必然偏离最优产业结构。克服这一困难的政策措施应该是减少制度性干预，鼓励竞争，重新激发市场活力。在技术市场失灵方面，产业多样化和产业升级本质上是一个改变“技术”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配置、实现更优生产的过程，先驱企业会市场创造公共知识。这种外部性难以避免。后发国家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初期，将技术引进生产几乎都是利用这种外部性、通过学习和模仿发达国家来完成，相对成本较低。然而随着资本积累、发展水平逐渐提高，生产所需要依赖的核心技术越来越难以拿到，而且，创新和研发活动作为技术的初始生产过程，具有成本高、风险性大、外部性难以完全内化收益的特点。新技术带来的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服务质量的提高，事实上是一个市场开拓的过程，没有既定的价格标准可循。且新产品和服务进入市场后很难排除其他企业的学习和模仿。甚至只有通过广泛传播和使用，才能实现这些技术产品的更大价值。鼓励技术的“生产”环节，需要政府在中努力补偿外部性的影响，最大限度地支持技术的“生产”，并由政府设计合宜的制度支付新技术给社会带来的外化收益。一般而言，技术的生产主要有两个途径——国家主导的大型项目的技术研发和企业个体的研发活动。国家主导的项目缺乏对市场进行追踪关注激励机制，从而可能缺乏对市场需求的有效判断。这种特点决定了国家主导的研发项目应该着重关注那些基础性的、外部性强的研究，致力于提供具有公共物品属性的知识和方法。以日本的经验来看，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大量引进科学技术，同时大幅增加科研经费投入，注重技术的实际经济效果，注重技术的推广和消化，这些做法对于日本发展节能型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企业个体对市场信号捕捉更加灵敏，它们的研发活动更加专注和